

浅谈钱钟书的翻译观

■付 晶

摘要: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曾被一些学者和专家誉为“文化昆仑”,他于1963年发表了《林纾的翻译》,首次提出“化境”说,他针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所提出的见解,在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将从介绍他的翻译观形成背景开始,谈论钱钟书的翻译观,其中包括笔者对“化境”的阐释以及他关于翻译功能和译者态度的看法,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钱钟书的翻译观,并给笔者和诸多译者更多翻译思想上的指导以促使译文尽善尽美。

关键词: 翻译观 化境 翻译功能 译者态度

一、前言

钱钟书先生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哲学、美学、诗学、语言学等,尤其对中西方文化的解读见地独特。此外,他还用文言文写成《谈艺录》和《管锥编》两部批判性著作,这两大学术作品深刻向世人阐释了中国古典文化,但他的成就却不止如此,在翻译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1963年,钱钟书在研究林纾的翻译作品后,撰写《林纾的翻译》一文,在其中充分评价林氏翻译的优劣,还表达了自己对于翻译的看法,提到了汉字的“虚涵数意”,他的翻译观便初见端倪。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深刻而严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提出的“化境”说作为翻译思想的集大成,引起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

二、钱钟书翻译观的形成背景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受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周边人群的影响,翻译思想亦是一样。要想窥探钱钟书翻译观其中之一二,就应该先从相应的时代背景中寻找蛛丝马迹。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人民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样,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众多文化知识的渴望,文学翻译事业发展迅速,自此也揭开了我国当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序幕。

1951年,“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成功召开,1954年,又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受会议内容和精神的感染,不少优秀译作如雨后春笋涌现,而后由于各种影响,文学翻译事业遭到重创,在此背景之下,诸如钱钟书之流具有较强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再次开始研究翻译问题,期望为中国翻译界提供较好的翻译理论指导。基于此,也逐渐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标准的深层思考,再次助力翻译事业向上发展。关于翻译标准的探讨,许多人都坚持严复的“信、达、雅”,也有人试图

推陈出新,钱钟书在参与大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后,将个人工作重心从文学创作转移到学术研究上,也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翻译观念和方式,“化境”说应运而生,这是他翻译理论的核心,也成为了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

三、钱钟书翻译观

钱钟书虽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具备丰富的翻译工作经验,却从不为翻译确立明确而唯一的翻译标准。在他看来,任何翻译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忠实与对等,彻底和全部的“化境”是翻译中不可实现的最高理想。翻译的主体分别是原文、译文、以及译者本身,本文会从介绍钱氏的“化境”说和他如何看待翻译功能以及译者态度三个方面,了解和探究他的翻译观。

(一) 钱钟书看“化境”说

“化境”首次出现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他曾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要想清楚“化境”说的深刻内涵,先从“化”字开始,荀子说“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从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改变外在形式而不变内在含义,这样原作的真面目就能被看清楚。虽将原作内容的语言形式更改为目的语形式,变外在而不变内在的过程之中,始终追求“化”,达到一种“境”,最终才可以引导译者完成使目的语受众易于接受且不脱离原作本身的绝世佳作。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到“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顾名思义,“神似”就是精准传达原文精神,脱离原作语言的外壳,通过纯粹的中文将原文字里行间的意蕴娓娓道来。钱钟书应是赞同傅雷的翻译观点,才会在其后提出与之不谋而合的“化境”说。既要求译者对原文能够有精确的理解,又不能死抠原文,一板一眼地进行直接翻译,可以称得上使原作

“投胎转世”“改头换面”，但却始终保有原本风味，这对于译者的翻译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标准，但钱钟书是清醒而理智的，他声称，“一国文字跟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要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是很艰辛的历程”。

翻译要想达到“化”的境界，必须同时有“变”和“不变”。最显而易见的“变”应是翻译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为了使翻译效果更佳，原作中总会有所东西流失，不可能全部保留，原语言和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和使用习惯大相径庭，应最大程度避免两种语言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牵强痕迹，作品在原文里不会读起来像是翻译出来的东西，那么翻译后的作品也应呈现此效果。最首当其冲的“不变”是作者在原作品中蕴含的个人思想和写作风格应予以保留，这也是翻译的黄金标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内容、思想和风格上忠实于原作，好的译文应像原作者用中文写出来的一样。翻译本身就是译者本身的再创作过程，他们可以根据原文和译入语习惯进行“入境”创作，至于“入境”程度深浅，就由译入语读者去把握了。“化”是翻译最高境界，是翻译最高理想，涉及到翻译的本质，贯穿翻译整个过程，也阐释着翻译的作用，同时也提及到翻译之间的距离以及对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探讨。很多人将“化境”看成是一种翻译标准和理想，遵循这一标准去进行指导翻译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译论，对如今的翻译工作一直具有指导作用，我们应以小窥大，以钱钟书的“化境”说为基础，进一步研究相关翻译理论，深入挖掘翻译理论与实践共生共补的关系。

（二）钱钟书看翻译功能

虽然钱钟书从未独立开篇详细介绍翻译的功能，但他总结出“虚函数意”四个字，以表达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翻译训诂所包含的意蕴。钱钟书提出，翻译应引“诱”、避“讹”，最终求“化”，“化”便是翻译的最高理想标准。翻译本身扮演着“中间人”或“联络员”的身份，充当着媒人一般，向大家介绍外国作品，用美言美语和有趣辞藻引诱大家去欣赏优秀外国作品，就像做媒一样，使外国作品和国内读者之间搭起了牛郎织女的“鹊桥”，每每相见，都觉得缘分妙不可言。国内读者省去读原作的麻烦，外国作品也摇身一变，经过翻译加工成为读者的“旧相识”，两者的联结变得愈发紧密。“媒”和“诱”其实指的是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是翻译的动力所

在。“诱”也分为正“诱”和负“诱”，翻译活动一旦产生，对于文化传播的效果立马显现。好的译文可以让译入语读者冲破与原语距离的束缚，拨开一层薄薄的云雾，即刻体会原作所要表达的美和内涵，而糟糕的译文会破坏读者对于原作的好印象，这样即使原作精髓良多，也会因在翻译传播过程中晦涩的语言和僵硬表达而大打折扣。翻译外国文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发读者兴趣去欣赏和阅读，学习外国文化当中值得借鉴的精华，从而迸发出新鲜灵感，引诱两个国家之间的语言相互交流，从而产生更为优秀的文化作品，便是翻译其意义所在，同时也能体现出钱钟书对于翻译文化传播价值相当重视。

季进曾在他的专著《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中写道：“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讹”。^[2]翻译过程当中“讹”是不可避免的，从宏观层面说，本身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就各不相同，也就导致不同国的语言体系和表达习惯相差甚远，即便是母语者对待自身语言文化中的细枝末节也存在困惑，更不必提译者在翻译再创作时碰到的诸多麻烦了。从微观层面讲，有人将翻译比作“带着镣铐跳舞”，“镣铐”指的是原作所处的文化体系及语言表达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翻译限制和挑战，译者能力与原作水平之间存在差异，即便译者在翻译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深刻了解原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涵，对于原作的理解也不可能同作者当时进行写作时那般透彻清晰。诸多因素产生了译文的“讹”，妨碍了读者了解原作的本来面貌，只是带着面纱“隔岸观花”，甚至会产生误解。于是许多读者产生彻底了解原作的想法，从而敦促他们去学习外语了解外国文化，好使将来能一观原作的真实面目，钱钟书自称“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虽然林纾的翻译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讹”，错译漏译比比皆是，还在过程中增加了自己即兴发挥的内容，这种“知错不改”的翻译再创作，却使钱钟书觉得林译作品中反倒出现了许多值得令人琢磨的精彩之处，每次研读都会有新发现，让人再三玩味欲罢不能，这也就成了“讹”的部分优点。

（三）钱钟书看译者态度

除了两种不同语言的差异跨度外，译者主观因素是造就翻译中“讹”的一大诱因，译者对于原作品内容和精神的理解有所出入，不可能透彻了解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即便面对面交流也无法理解得分毫不差。此外，译者

的阅读体会和自身的表达能力以及驾驭文字的技艺之间也有相应的距离,从理解原语言到转化为译入语,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难以企及的“间隔”,各种因素造成了“词不达意,书不尽言”的尴尬情形。鲁迅说过:“字典不离身,冷汗不离手。”翻译并不是随便查查字典就能解决的,字典中存在既定俗成的众多之义,但译者可能无法查到原作所要表达的含义,有“译”必存“异”,译者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不断思索究竟可以使用哪些字词,以保证转化后的译作最大程度如同原作般“原汁原味,风采依旧”。

钱钟书在《谈艺录》里指出,“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原作者驱使原文所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3]钱钟书十分注重译者的自我发挥,他不仅相信存在比原作更好的译作,还鼓励译者运用语言能力与原作者竞争。他充分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性过程,翻译艺术是可以任由人去书写挥洒的。译者在跨文化交流沟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同翻译本身存在“诱”的功能,演绎翻译这一过程的译者也担当着“媒人”的职责,既然要“做媒”,就应该对原作品的“身世”了如指掌,还要信手拈来“译作”,妙笔生花,促成这一桩“文化姻缘”。作为译者,应当对原文通篇有着透彻的理解,还要具备译入语与原语之间的灵活转换能力,在翻译时游刃有余地将原文之美通过译入语展现出来。

四、钱钟书翻译观对当前翻译活动的启示

结合钱钟书翻译观,将翻译过程总结为四个环节,先引“诱”,避“讹”,再求“化”,最后实现“打通”的最终目标。虽然这种翻译境界没有确切的评判标准,但诸多译者依然能在这种翻译观中找到指导自身进行翻译活动的准则和企图达到的境地。首先,在实现引“诱”前,译者应端正翻译态度,正确定位自身角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道理众所周知,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人工媒介”,作为原作和译作的“桥梁”,译者需要在充分理解原作和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及文化背景的译作之间寻求平衡,既可以保留原作的独特风格,又能使读者最大化接纳译作。因此,译者对待原作要保持敬畏之心,深刻理解原作表达和风格,认真进行翻译活动,将原作转化为完美译作,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也会得到充分提升。“讹”是翻译

中难以避免的却要下意识避免的,译者应当在日常多多积累,只有涉猎广泛,才能在遇到各类翻译工作时迎难而上,想尽办法解决掉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讹”,当然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束缚在许多框架条例里的再创作,如原作有不尽人意之处,译者可以笔补造化,保证译作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创作出更多值得反复阅读的精彩之处。^[4]保留原作的“精髓”而改变其形式,需要译者冲破语言和文化的层层阻碍,先“融入”进原作,感受作者所感受的,领略作者所表达的,再努力“化出”,将在原作中得到的所感所悟一同“搬出”,充分呈现出同原作内容和风格几乎“一模一样”的译作,带给读者欣赏领略,以试图达到“化境”的理想境界,从而离实现“打通”的最终目的更进一步。

五、结语

翻译首先要发挥“诱”的作用,竭力减少和避免“讹”,尽最大努力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化”,最终实现翻译的终极目标“打通”,这是钱钟书一生的追求,也是他翻译观的核心。钱钟书的翻译观受文艺美学和文艺批评理论影响,肯定了艺术主体的创造性,明确了翻译性质和要求,打破了传统思维惯例,从美学角度再次将翻译标准和理想推至高点。有了钱钟书翻译观的支撑,许多译者都可以大胆发挥创新意识,不必步步拘束画地为牢。翻译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如何使艺术达到更高阶的境界,全看译者如何用思维的火花与灵光笔下生花,将原作的思想精髓表现出来甚至更胜一筹。

参考文献:

- [1]王禹霏.浅谈“神似”与“化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5).
- [2]段少明.中国译论的高峰——钱钟书“化境”说[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3]张丽萍.钱钟书“化境”思想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7.
- [4]袁帅亚.钱钟书“化境”论翻译思想内蕴探析[J].出版广角,2019(17).

(作者单位:郑州城市职业学院)